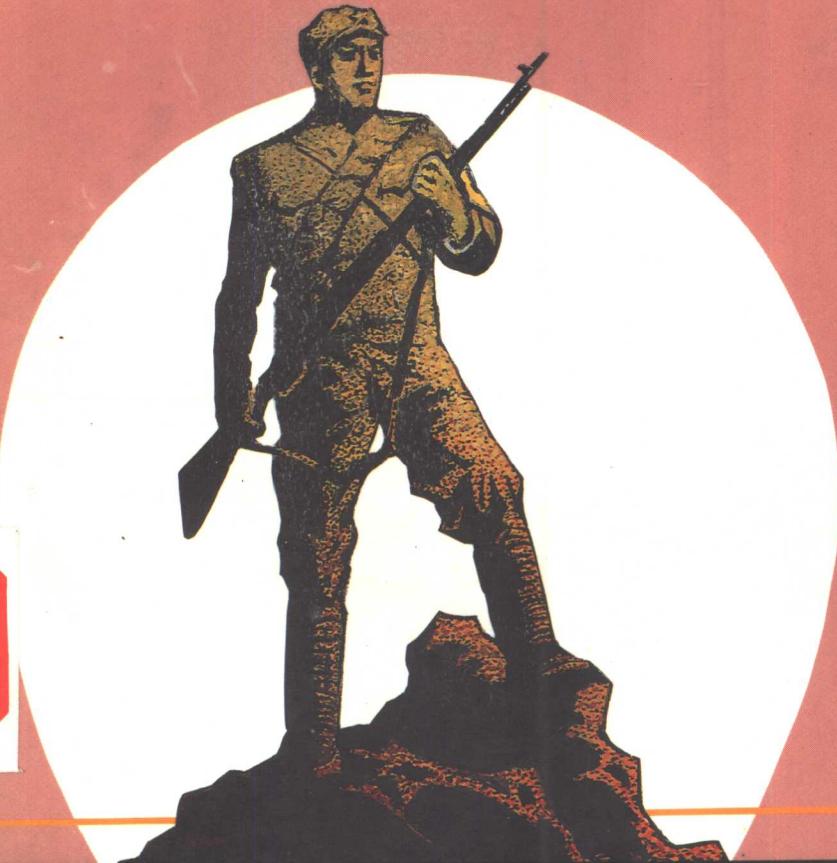


血沃勁草



——征途的回忆与怀念

吴健民



广东人民出版社

征途的回忆和怀念

血沃劲草



封面题字 任仲夷
封面设计 吴 斯
责任编辑 陈 保
责任校对 蔡沛泉

作 稿者 供 出 版者 经 销 印 刷 号 价 定 版 次

吴健民 南方图书工贸公司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省新华书店 广州海院刷印厂 ISBN7-218-00422-9/1·43 四圆壹角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



作 者 肖 像

血寒寒英以中
原肥幼冲
西雄以大以炎春
多故謀夫病革
宗政彈臂鶴
魯止林
己亥年夏月 吳健武

目 录

序	魏金水 (1)
抗日韩江纵队的回忆	(3)
对潮汕地下党的建设等一些问题的看法	(27)
——在潮汕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议上的发言	
谈抗日战争时期在潮汕活动的一点体会	(43)
——在饶平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关于潮澄饶地区党活动的一些历史情况 (一次谈话记录)	(61)
一次向方方汇报的前前后后	(77)
——1948年闽粤赣边区形势的回顾	
记联系叶飞兵团的入闽之行	(90)
鞠躬尽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102)
——缅怀林美南同志	
永远怀念地下斗争的优秀战士——周礼平	(112)
在闽粤边坚强奋斗的革命母亲	(131)
我们的好班长	(137)
——怀念曾广同志	
长期投身农民运动的优秀党员	(145)
——回忆余锡渠同志的一些革命事迹	

昔年青年运动对当代青年的启迪	(156)
——为纪念惠来抗日青年而作	
记普宁《青报》转入地下前后	(162)
莲花山下的一次谈判	(169)
林代表讲笑话	(175)
我在潮安十二年	(177)
——为纪念潮安解放四十周年而作	
附录：《韩江纵队史》结束语	(186)
《第四支队史》前言	(190)
《第四支队史》结束语	(194)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潮安监狱政治犯 的斗争纪实》代序	(198)
韩纵第一支队烈士纪念碑前讲话	(200)
纪念闽粤赣边纵队成立四十周年	(204)
——汕头纪念会上发言	
后记	(208)

序

魏金水

潮汕地区革命历史源远流长，潮汕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

在革命战争年代，潮汕是我们党领导的闽粤赣边区的组成部分。潮汕与闽西南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并且这块边区战略阵地具有滨海山地的优势。潮汕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与海外关系密切，是闽粤赣边区的战略要地。同时，这里又是闽粤赣边反动势力统治较强的地区，是国民党反共的军事中心。然而，英勇的潮汕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尽了艰苦曲折，奋斗不息，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武装斗争曾进入一段低潮。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全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潮汕党组织领导人民又进行英勇的抗日战争。他们在敌伪顽夹攻的险恶环境里，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认真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广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善于利用当局承认的和合法的抗日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运用各种形式，争取爱国军队、国民党当权者、地方士绅、知识分子上层、海外侨胞、甚至宗族性的土匪武装，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进行平原地区敌后游击战争。

他们依靠农村，又把山区与平原抗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根据时局的发展，以凤凰山、大南山、大北山为中心，利用闽粤两省边界的间隙，采取量力而战，吃得下的就吃掉、打得赢的就打、打不赢的就跑的战术原则，成功地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并不断

地壮大自己。到1945年6月成立韩江纵队时，已拥有二千多人枪；还有抗日地下军和游击小组数千名的外围武装力量。他们先后歼敌六百多，缴获各种枪支七、八百支，还有机关炮、电台和大量物资、弹药。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潮汕人民经过近两年的准备和发动，展开了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1948年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闽粤赣边纵队时，潮汕支队，编为边纵的第二支队。二支队在中共闽粤赣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不断壮大自己，扩展游击战争的范围，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局势。韩江支队第十一团（后来扩大成边纵的第四支队）曾挺进外线作战，与闽南支队会师，初步建立了闽粤游击区一条宽阔的“活动走廊”。1949年，在全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潮汕军民与边区纵队一起，解放了潮汕地区，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潮汕人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雄人物辈出。其中有我熟悉的林美南同志和同志们敬佩的革命老妈妈李梨英同志。他们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褒扬和学习！

吴健民同志写的《血沃劲草——征途的回忆与怀念》，如实地生动地叙述潮汕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实和英烈们的英雄事迹，展示了当年革命斗争的风采，受到各方面的欢迎。我作为在闽粤赣边区长期进行革命工作的老战士和幸存者，对这本书读起来尤感到十分亲切。因此，我乐于为之作序，并将此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1988年12月18日

抗日韩江纵队的回忆

韩江带着闽西老根据地的革命传统和豪情，奔流入粤。她荡漾向前，有时也急促地跳动，低声地呼啸；她汇集着闽粤边人民苦难日子里的血泪，召唤着两岸人民子弟兵的斗志，闯出南海，投入大洋。

在韩江的长流中，有些河段，曲折迂回，击石冲溅，在重重阻力中杀出活路；有些河段，像聪明的战马，谨慎而刚毅地排除沙淤，越险前进。有时碰上干旱，在炎阳的压力下，又坦露胸脯，将干涸的河水，化成涓涓细流，坚持着艰难的冲刺。山洪涨来，她恰如猛虎下山，奔放澎湃，激泻千里……

韩江，是哺育着闽粤边人民的母河。她是这一带千万人民战斗的象征。

我常常这样想：抗日韩江纵队的诞生和成长，确实也带上韩江母河的秉性。

韩江，是我和战友们战斗多年的地方，是我长期接受革命教育和考验的地方。讲韩江纵队，我知道的只是不完全的情况和一些侧影，那近10年经历的回忆，还得从头说起。

(一)

1936年10月，潮汕已经有“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这是潮汕地区最早的具有系统和较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团体。也带着随时准备上前线的军事色彩，并成为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这件事，我在香港见到李平时才知道。

我是1936年9月到香港的。因为父亲（吴华胥）的关系，经常

来往于连贯、蒲特（饶彭风）、吴有恒、罗雁子（罗理实），以及吴涵真、李育中等人之间，传递讯息。我参加党在九龙的外围组织之后，除经常找领导人梁上宛之外，也常到罗雁子家里。1936年12月，我在罗雁子那里见到了李平，罗把我介绍给他，说我也是“老乡”。谈起来，他知道我和方倚华、方寄华（方东平）曾是同学，气氛更为亲切。

“来香港之前，方倚华、方寄华，还有她妹妹方丽君，曾有一次从汕头回乡，到我家看我。带给我一本《八月的乡村》和许多新刊物，并动员我在惠来组织读书会。她们的言谈对我启发很大。大家的见解一致，谈话很相投。后来，我便组织了读书会，还刊出了大型壁报。因为教书不成，才到香港来。”我说，“不过，抗日救国必定要有武装，我看要着重教育动员地方的军队……”。

李平笑着对我解释“爱国进步的青年，也随时应有武装上前线的准备”这种道理。我也因此知道了他正在汕头进行组织“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的秘密活动。

几个月后，我决定离开香港回潮汕去。我去找梁上宛，提出这个请求，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梁上宛说：“你去吧，内地抗日救亡运动需要更多的学生青年。你回去后的事，将来我会告诉你们家乡的同志的。”

1937年的上半年，到我家找我父亲的人增多了。其中以李碧山来得最多。有一次，连贯领着张劲夫到我家里来住。他们的活动我不敢过问，但我知道这些都是可亲的同志，我还告诉过李碧山：我也准备打回老家去。

1937年七、八月间，我回到惠来。这时候，芦沟桥事件已经爆发。“西南事变”后由蒋介石扶持上台的余汉谋主政广东，也作出一些支持抗日的姿态。潮梅党组织抓住这个时机，根据南委的指示，在原来“义勇军”的基础上，扩大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

团体，全面推动潮汕各县市的救亡运动。发展得最广泛的，算是各地“青年救亡同志会”。

我在惠来，先在惠来中学联合爱国老师组织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后来，扩大团结面，发展成全县比较有规模的抗日艺术团体“银河剧团”。剧团上演的剧目有《秋阳》、《放下你的鞭子》、《北地狼烟》、《刑》、《桃花源》等等。当时，先后组织起来的团体还有“惠来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为“惠来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教师抗敌同志会”、“先路剧社”、“学工队”、“战时工作团”……我们每天晚上轮流到十字街口读报，还开展歌咏游行、街头活报剧、化装宣传等活动，吸引了大批群众。当时党组织还决定，通过各种群众团体到农村去举办夜校、识字班，编撰抗日夜校课本。通过学文化，在沿海以及山区农村进行抗日民主宣传。我们还通过当地的封建宗族关系，争取了地方实力派，争取了国民党当局的配合、支持。银河剧团下乡演出，以自卫和道具需要为名，一次能借到10多支步枪和2支驳壳枪。另外，通过党的学生支部的工作，取得中学校长的批准，我们掌握了学生军训发给的30支步枪和二三百发子弹，使学工队成为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的预备队。

潮汕其他各地，也掀起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抗日热潮。汕头市成了粤东一带抗日群众运动的中心。我潮汕党组织还秘密掌握了汕头《星华日报》这个阵地。又出版了《抗敌导报》、《岭东通讯》，以及后来的普宁《青报》等刊物。同时，地方党组织强调进行当地驻军和地方团队的统战工作，先后组织了几批随军工作队，派大批骨干进入国民党广东当局举办的省民运干部训练班、民运督导团、民众抗日自卫团妇干所、教导队、社训队等。既争取合法的活动形式，又借此在军事上初步训练我们一批青年骨干。1938年2月，地下党员黄遗（黄雨）在省民运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回到潮阳，协助青抗会组织了达濠一

支渔民抗日突击队，对发动沿海渔民，起了很好作用。至1939年运动的高峰时期，以青抗会为核心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人数，超过2万人。在我党各种形式的宣传发动之下，接受教育、投入运动的职工、农民、渔民、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大约数十万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潮汕地区的党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底，惠来党员人数130人左右；普宁1100多人；潮阳约200多人。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党组织同时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和气节教育，加紧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组织准备。

1938年六七月，日寇两次攻占南澳县，潮汕形势紧张。9月下旬，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来潮汕开会进行备战的部署，提出“一切为了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潮汕游击战争”，要求进一步做好训练干部、培养游击战争骨干的工作，还确定日寇入侵时我方人员的集结地点。同时，决定潮汕中心县委属下，先建立潮（阳）、普（宁）、惠（来）、南（山）分委，落实适应独立作战的体制，如果敌人占领汕头沿海，分委即改为中心县委；潮汕中心县委则只管潮（安）、澄（海）、饶（平）、汕（头）、揭（阳）一带；两个中心县委都直接由特委领导，各自独当一面，指挥作战。

根据上述指示，1938年11月，潮汕中心县委举办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参加者约40余人。闽西南潮梅特委组织部长谢育才（曾是1935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军分区政委）来到汕头，亲自到训练班讲课。惠来方面，也举办了《大众学园》，以党的理论政策培养一批青年。我也在1938年12月到普宁流沙参加“寒假青年学术讲座”活动。这时候普宁青年工作的公开领导人是王森泉（王致远）。当时请吴金讲游击战术课，还进行了几次夜间军事演习。接着，我又参加了分委举办的区委书记训练班，听了马士纯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课，他讲得非常生动深刻。这时，分委秘密领导开设了合利书店（附设有印刷厂），大量翻印了毛泽东

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书籍，发行甚广。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东江一带党领导的小型武装力量立即进行抗击日军战斗。同年12月，东江人民游击总队成立并展开活动。1939年4月，这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国民党当局正式承认。以后一段时间，在公开合法名义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一形势的变化，对潮汕的影响甚大。

(二)

1939年6月12日，日寇入侵汕头，汕头市沦陷。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抗会骨干，按地方党组织原先的布置迅速集结，组成队伍，奋起抗击。

这时，我仍在惠来活动。惠来正遭受日寇飞机多次的轰炸。惠来的党组织，将学工队改为“惠中学生战时工作队”，积极参加战争的消防救护。同时，派一批骨干加入地方当局组织的抗日自卫大队，成立“志愿独立小队”，进行武装抗日保乡活动。

正当潮汕人民惨遭屠杀，革命志士浴血抗战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以及分布在潮汕各地的特务、反动分子，却暗中制造磨擦，破坏抗日。有时来自这方面的疯狂进攻，不亚于日寇的凶狠。

1939年冬，我与林家铨（林川）、曾冰3人一起到梅县参加特委举办的县委干部训练班。方方在讲课中概括地说到：当前形势，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的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又是我们党和党掌握的武装，不丧失对这种危险的警惕，坚持抗日；而且以模范的抗日行动赢得人民拥护，并发动群众克服这些危险。当时，为抗击日寇而组织的人民武装——汕头青抗会游击队，正是经受着这种严峻的考验。

最早出现在作战前线的汕青抗游击队，取得“中国国民革

城命军独立第九游击队”番号之后，就开赴指定的地帶——潮安西北廂那个仅有6平方公里的狭小丘陵区去活动。这分明是顽固派布置的一个“借刀杀人”的格局。但是，我们的队伍出于抗日救国的忠诚，毅然接受了这极端险恶的安排。游击队取回先前埋藏的10多支步枪，扩大队伍，调整纪律，配备救护人员，在群众的热烈支持下，勇敢机智地投入战斗。在西塘和云里山两次阻击日军，毙敌8名，伤敌10余名，初战告捷，声威一振。接着，我游击队副队长黄玉屏带领侦察班，深入到潮安腹地、韩江西岸小镇——云步去抓鬼子。另林克清、许英各带一小队配合掩护。当日寇特务长加藤始助大摇大摆来到堤顶食店喝酒时，李朝道上前一把抱住敌兵的头部，用手臂卡住他的脖子，另外几个侦察战士抓住他的手脚。这时候，敌特务长拚命挣扎，力大如牛。新战士王炳荣上前使用气功，对着这鬼子的鼻梁一刮，这家伙马上瘫下来了。战士们向当地群众借来一把木梯，绑上鬼子抬走。附近的鬼子闻讯出动，遭到我两个小队截击，不敢远追。就这样，汕青抗游击队深入虎穴，活捉鬼子，成功地挫击了侵略者的凶焰。

在这个时候，潮安方面党的力量深入到三、四、五区以及意溪等地，掌握地方自卫队，控制了100多人的武装队伍；还有焦山、大寨2个游击队，二区、六区、七区的游击小组，也共有100多人。澄海方面，党组织派了一批骨干打入李少如的自卫大队，部分地控制了这支地方武装，后来在反攻澄海县城的对日作战中起了很好的作用。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潮安、澄海、饶平纷纷组织战时工作队，组织军民合作站，动员群众巡逻放哨，防奸肃特，支前慰劳，防空救护，传递情报，潮安五区战工队掌握的一小队武装还直接截击并缴获了日军的汽艇。

澄海莲阳以余锡渠为首的永平党支部，执行潮澄饶中心县委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他们利用民间的福利组织团结群众，举办夜校，互助生产，兴修水利，守护庄稼，救死扶伤；

还利用封建矛盾，开展统战工作；创立抗日武装活动的转动点，组织秘密游击小组提供情报；利用封建土匪武力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参军等等。

战斗继续展开。在一场反击日军集结雄厚兵力向国民党乌洋山驻军保安团进攻的恶战中，我游击队主动策援友军，英勇侧击日寇炮兵阵地，牵制了日军主力，掩护保安团的转移。日军占领乌洋山之后，我游击队又到云步日寇据点外围袭扰，敌寇深负后顾之忧，不得不撤离乌洋山。这一役，打得机动灵活，歼敌10多人。接着，第二次乌洋山之战，日寇以1000多人的兵力，更大规模地从两路夹攻乌洋山。我游击队在10倍于我的强敌面前，激战终日，孤立无援（附近保安团却按兵不动）。最后，第三小队队长许英因掩护撤退而受重伤，被送到独九旅后方医院，竟遭到反动军医的虐杀。

随着形势的变化，根据持久战的精神，潮汕党组织派出一批骨干进入敌后，开展群众工作。遂后，成立潮澄饶敌后区委，区委书记是陈锐志。以后又成立了汕庵区委，区委书记先后是周礼平、陈培志。新成立的潮澄饶中心县委也设立敌后工作部，由周礼平负责。这大约是1939年10月的事。从此，韩江三角洲这一带的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更大的周转余地，党在敌后的地下活动也得到了加强。

由于我潮汕党组织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对国民党独九旅执行既争取又斗争的原则，所以，汕青游击队虽在顽固派强大压力之下，仍然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斗。这就是：夜袭阁洲，全歼伪自警团；配合反攻澄海县城作战；青麻山反日寇扫荡作战。后来，由于独九旅中的顽固派准备以集训为名，诱歼我游击队，我党才断然结束这10个月来的抗日武装队伍公开斗争形式，公开宣布“解散”队伍，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荫蔽精干，以多种形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三)

1940年6月，有一天，潮普惠南中心县委书记罗天告诉我，要我参加一个武装小组训练班的讲课。当时，我负责中心县委的青年工作，要我讲课的题目是《潮普惠抗日青年运动的形势和经验》。这次在训练班讲课的有罗天、林家铨、陈焕新和我。训练班设在普宁三区的藏宝堂学校内。武装小组在训练班的成员是黄玉屏、马毅友、陈子诚、刘永涛、林克清、方思河、胡光云等人。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两个月前在汕青抗游击大队“解散”荫蔽下来，派到潮普惠的一个武装小队。这是仅有的两个小队之一，另一小队则派到潮澄饶一带。

当时潮澄惠南中心县委的军事部长是张鸿飞，武装小队的活动多是由他联系的。听说不久还有吴英、张子掌、陈慈坚、杨溪、陈伯平、郭克、陈锦华等人先后参加武装小队活动。7月，缴获潮阳大坑恶霸一挺旧式水射轻机枪和数百发子弹。之后，在进行第二次收缴枪支的武装行动时出了事故，刘永涛牺牲，陈子诚被捕（后营救出狱）。以后的军事行动也不顺利，人员变动较大，这个武装小队停止了活动，转入地方工作。

1940年上半年，中央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还提到：当形势不利，应适当转变方针，暂时化整为零。这时，日伪为巩固潮汕占领区的统治，频频袭击我靠边防线某些农村基点；国民党顽固派也在这里加强反共活动，制造逆流。战争中，广大农村，特别是沦陷区乡镇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潮州、庵埠市镇居民断炊后，捡日军军马马粪淘取麦粒充饥，当时饿死者日以百计），物价日日飞涨，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这一切，构成潮澄饶地区矛盾交叉、错综复杂的局面。